

研究文库 · 12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市场化与 宏观稳定

张曙光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市场化与宏观稳定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张曙光 主编

经济研究文库·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化与宏观稳定/张曙光主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

(经济研究文库·12)

ISBN 7-80149-631-0

I. 市… II. 张… III. 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研究-中国 IV. F12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836 号

经济研究文库·12

市场化与宏观稳定



主 编: 张曙光

责任编辑: 周 丽

责任校对: 刘玉霞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5

字 数: 32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631-0/F·195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经济研究文库》编委会

总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洛林 刘国光 张卓元 董辅初

总主编：刘树成

副总编：吴太昌 王振中 朱 玲

秘书长：周 济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祖尧 王振中 厉以平 左大培

刘兰兮 刘树成 江太新 朱 玲

朱荫贵 吴太昌 李 实 赵人伟

罗德明 周 济 张 平 张曙光

冒天启 胡淑珍 郑红亮 袁纲明

韩朝华 董志凯

《经济研究文库》总序

多出精品 多出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合作出版的《经济研究文库》这套大型综合性系列丛书，现在问世了。这套《文库》的问世，源于经济所的特点。相对而言，经济所具有这样三个特点：一多一长一大。

“一多”是指人数较多。现定编名额 174 人，离退休人员 136 人，总规模为 310 人。人数多，人才亦相应较多。现有研究员一级职称的（含离退休）共 77 人，副研究员一级职称的（含离退休）共 83 人，具有高级职称的共 160 人。在 55 岁以下的中青年研究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25 人、硕士学位的 38 人，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共 63 人，占中青年研究人员的 78%，即约五分之四。

“一长”是指历史较长。经济所的历史可以有三种算法：第一种是从 1929 年算起，即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陶孟和先生 1929 年创办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社会调查所算起，那么，到 1999 年共走过 70 年历程。第二种算法是从 1949 年算起。随着 1949 年 4 月南京解放和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该

所由陶孟和为所长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由此算起，到1999年共走过50年历程。第三种算法是从1953年算起，即从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算起，那么，到1999年共走过46年历程。按照第二种算法，经济所的成长和发展是与新中国同步的。

“一大”是指名声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在学术园地上，产生出以孙冶方同志为代表的一批既治学严谨又勇于探索的著名经济学家。在新中国的经济成长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历史时期中，他们紧跟时代的步伐，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付出过自己辛勤探索的心血，奉献出自己潜心研究的成果，留下过自己奋发开拓的足迹。

全新的、内容博大的、丰富多彩的改革开放实践与现代化建设实践，是理论创新与人才成长的肥土沃壤。为了继承和发扬经济所的优良传统，发挥经济所人才多、科研力量相对较为雄厚的优势，我们特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携手合作，出版了《经济研究文库》这套大型综合性系列丛书，将经济所今后撰写和主编的主要学术著作统一编号出版，以凝聚全所力量，形成拳头效应，争取在理论前沿的不断探索中多出精品、多出人才。我们一定不辜负时代的期望与重托，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在跨世纪中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推进我国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最后，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刘树成

1999年元旦

前言 市场化与宏观经济稳定

一、市场化和逆市场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就进入了市场化的过程。经过 20 多年的积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开始建立，市场行为主体正在成长，市场交易的规则逐步形成，中国人已经初步尝到了市场化的甜头和苦味。虽然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事还不乏其人，但市场和市场制度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生根发芽。

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速度是很快的。尽管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但在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仍然是广泛的、巨大的和深远的。不仅在公有制经济旁边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非国有经济，而且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行为方式；不仅绝大部分物质产品的价格已经由供求双方的市场交易决定，而且很多特殊领域的市场化也有很大推进；不仅是市场竞争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而且在迅速结束了长期的短缺之后很快出现了生产过剩。总之，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化的创造层出不穷，市场化带来的变化令人应接不暇。

然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终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生发的过程，而是一个在自然发育基础上由政府推动的过程，或者是在

政府主导下的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由于市场化的初始条件不同，市场化的道路和方式选择有别，因而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市场化既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自然发生的市场化不同，也与转轨中国的情况有异，不仅表现出巨大的复杂性，而且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市场化和非市场化、逆市场化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光怪陆离、斑斓夺目的图画。

第一，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及其行为选择始终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由于由此出发的基础是一种基本上完全由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而市场化的推进又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管制下发生。市场化与放松政府管制和打破国家垄断表现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市场化的闸门最初是由政府打开的，而不是由市场力量冲决的；市场化的推进是得到政府认可的，政府不认可的市场化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会遭到取缔；政府在推进市场化的同时也为市场化设置了很大的障碍。因此，市场化过程的扭曲和逆市场化过程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府的行为连在一起的。

第二，自然生发的市场化过程，的确是一个渐进而有序的过程，无论是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市场结构的发展，还是市场组织的变化和交易方式的变迁，都具有这样的特征，都是市场主体自发寻利和互动互惠的结果。如从偶然交易到定期集市再到大型化商业企业以及网上交易的发展，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再到货币以及证券市场的发育，从个人企业、合作企业到股份公司发展等。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过程，一方面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这使得中国的改革进程在总体上适应了市场化自发演进的规律；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又是一个立体交叉密集进行的过程，许多在历史上曾经是先后发生的过程，在我们这里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许多经历过长期演变的事情，在我们这里

却要在短期内完成。这就使得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无法避免人为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人为的因素融入自然演进的过程。

第三，发达国家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化和货币化，是与城市化、工业化一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并没有遇到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和障碍，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虽然面临着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任务，但却建立了市场制度的基础。与这些国家不同，中国目前的发展，既包括了自然经济的市场化和货币化，也包括了计划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而且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工业化和信息化交织在一起。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的同时并进，既增加了两种转型的困难，也提出了一些过去不曾遇到的新的问题。

第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是与对外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明显不同。发达国家曾经是世界市场的开拓者，一直处于游戏规则制定者和创设者的地位，且不说其凭借实力和武力进行的掠夺，就是这种先进的地位也使其尽得其利。中国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相对晚了一些，不仅面对的是比自己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是只能接受和遵从既定的游戏规则。这里既有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中国只有扩大开放，才能进一步推进市场化，但在目前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下，开放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弄得不好，也会使市场化受阻，或者使市场化出现反复。

第五，中西文化的差异也是市场化中的一个重要变数。以个人的独立自由为基础和核心的西方文化，为个人的创造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而以家国为重的中华文明，在一些方面却存在着某些不利于市场化发展的要素，再加上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放大和市场化过程中的扭曲，就使

得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不仅要以思想上的自由化为先导，而且要以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为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市场化就是契约文化、债信文化等的形成和普及的过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必然会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是一个可能会发生逆转的曲折过程，市场化和非市场化、逆市场化同时并行，这里前进，那里倒退，不断地试错，不断地反复，形成一个从总体上来看是自然演化的历史过程。

二、市场化中的宏观稳定

上面的讨论似乎离题太远，因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通常是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考察经济运行的短期态势、总量关系和政策操作问题。因而，提出和讨论市场化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问题，似乎是有悖常理，且有“煮糍糊”（樊纲，2000）之嫌。其实，非也。

正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是在经济市场化基本完成，市场制度完全建立并得到巩固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以制度给定为基本前提自然是一个合理的假定，不仅合乎历史的发展，而且符合理论的逻辑。但是，在中国现实的具体条件下，制度给定或者制度外生就是一个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实际的假定。因为，经济市场化是当前中国最重要、最深刻的事件，其影响和作用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来说，它既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影响和决定宏观经济变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例如，就业和失业问题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对象和核心内容。在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下，就业（失业）变动与经济景

气循环密切相关，但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就业变动就不只是与景气循环有关，而且是与制度变化相连。在 90 年代中期前后，中国经济体制中一个明显而重要的变化是国有职工的就业问题。在 90 年代中期以前，国有企业职工仍然是端着铁饭碗、享有终生就业权利的国家主人，虽然可以不干活，但不会失业。然而，自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下岗分流以后，铁饭碗被打破了，失业问题提到了每一个国有职工的面前。这一点使传统国有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质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和相当深刻的。90 年代末中国发生的通货紧缩不能说与此无关。

再如，货币供应量是宏观经济运行和调节的一个重要政策变量和政策工具。在发达的市场制度下，不论是直接调节货币供应，还是运用利率杠杆，均是根据经济运行的态势而定，不必考察银行金融业的制度安排及其变化。但是，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首先，货币量的多少就不能仅仅根据经济景气循环的需求来决定，而且要考察市场化和货币化的需求；而后者也不仅是物质产品和流量资产市场化和货币化的需求，还包括服务产品和存量资产市场化和货币化的需求。其次，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也不像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么明显和有效，而是随着具体制度安排的调整而变化，变化的程度也不一样。仅仅一个贷款权上收和贷款终身责任制，就使得货币扩张政策的效应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且不说银行业集中化趋势的影响。

还如，预期因素自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以后，就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拓展方向，也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预期的形成和作用却有明显不同。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预期的形成和作用与经济运

行走势和政府政策操作相关，而处于市场化过程之中的中国，预期的形成和作用首先是与市场化过程的选择有关。随着下岗失业的增加，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体制的变化，人们的收入预期看淡和支出预期增加，促成了通货紧缩的发生。可见，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制度因素不仅不能外生给定，而且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宏观经济变量决定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

也许有人会说，制度因素是一个长期问题，而宏观经济分析考察的是短期问题，将制度分析纳入宏观分析的框架范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错，一般来说，制度变迁是个长期因素，宏观分析也主要是考察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正统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对此都有明确的界定。但是，必须指出，宏观经济分析虽以经济的短期波动为主要对象，决不是不讨论长期问题，有人著文对此作过专门分析（卢锋，2000），就以在中国畅销的曼昆的《经济学》，其宏观部分共有五章，其中三章是讨论长期问题。更何况长期和短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长期是由短期组成的，长期的经济决策必然会影响到短期的经济走势。至于作为长期因素的制度变迁，其在短期内并不是一片空白，而是有着明显的短期效应，更何况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是一个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一个渐进过程，其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影响是明显的和巨大的，如果舍去了市场化的因素，我们可以肯定，就不能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作出有效的和经得起检验的解释。因此，是墨守正统宏观经济学的界定，把制度因素排除在宏观分析之外，还是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将制度分析引入宏观分析，从一个新的分析角度切入，进而建立起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前者，不仅会禁锢自己的思想，而且会忽视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如果是后者，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将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基础和有益的借鉴。本书

采取的是后一种立场，即“努力把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运行分析和制度分析结合起来，探寻宏观运行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如何决定了宏观变量的变动”（张曙光，1999）。

既然市场化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那么，它的影响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市场化的效应是紧缩的，还是扩张的？是平抑了经济波动，还是加剧了经济波动？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那就是，“不确定”。

市场化的扩张效应很明显，土地市场化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着大批的土地资源投入市场，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其带来的扩张效果是巨大的，1993年和1994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与此有很大关系。至于其紧缩效应，前述有关下岗失业和社会保障改革的分析就说明了这一点。与市场化的效应相对应，逆市场化的效应也具有扩张性和紧缩性两个方面，如果说银行业的集中化趋势和农产品收购方面垄断性经营的强化导致了宏观上的紧缩效果，那么，扩大政府集中配置资源的某些方面就会在造成体制性收缩的同时，产生宏观上的扩张效应。

既然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和径挺直遂的，而是有曲折，有反复，前进和后退、市场化和逆市场化同时并行，相互交错，非常复杂。而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效应都是不确定的，既可能是扩张性，也可能是紧缩性的。因此，市场化过程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市场化和逆市场化各自所具有的扩张效应和紧缩效应如何匹配，也取决于市场化和逆市场化如何组合。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调节必须将市场化的因素考虑进来。

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没有消除经济的波动和危机，市场经济也没有摆脱经济的波动和危机，只是波动的性质和危机的情况有所不同罢了。对于前者，一些人至今不愿意正视和承

认；对于后者，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公开否认。最近，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美国哈佛和麻省理工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进一步明确指出，“所有国家都有陷入危机的可能，不管它有多强大，美国也不例外”（廖理等，2000）。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更不可能消除和避免经济波动和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能够幸免，决不意味着中国具有了避免危机的免疫力。因为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仅会存在两种体制的摩擦和矛盾，而且在这种摩擦和矛盾中往往会抑制二者的长处，尽显二者的劣势；不仅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更大，而且政策的作用往往会被体制上的变动所抵消。因此，在体制变革时期，宏观调节的难度也更大。

三、本书对市场化中宏观稳定问题的讨论

本书集中讨论了市场化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讨论的对象是 90 年代的中国经济运行。作为过去研究的继续（刘国光主编，1991；樊纲主编，1997），本书是既有继承，也有发展。虽然讨论的都是宏观经济稳定问题，但 90 年代中后期与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虽然都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的研究力量为主，但人员组成也有很大变化。这里，我们想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 90 年代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市场化也有了很大的推进，中国经济不仅逐步摆脱了长期以来的短缺困扰，出现了相对过剩的情况，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波动的性质和特点开始从原来的计划周期向市场经济的景气周期转变，因而不仅发生了通货膨胀，而且出现了通货紧缩，同时形成了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本书不仅讨论了通货膨胀，而且讨论了通

货紧缩，并且从各个方面对此展开了分析。这也许是与以前讨论宏观经济稳定问题的最明显的不同。

第二，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已有很大提高，内外经济双平衡的问题提到了宏观经济分析和调节的议事日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针对这种情况，本书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如果说过去以讨论贸易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为主，那么，现在不仅要讨论贸易问题，而且要考察国际收支和汇率问题。因而在本书中，我们将此分开作为两章来分析。

第三，在中国90年代的经济波动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说1993年以后的紧缩主要依靠适当从紧的货币政策，那么，1998年开始的经济启动则主要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本书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照，既讨论了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及其在各个方面的实现，包括财政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差异，财政扩张与投资乘数，税率高低与利润边际，税负不公的效率损失和宏观后果等，也讨论了金融结构和货币政策，说明了货币政策的作用和局限。

第四，为了借鉴和比较，本书最后一章讨论了发展和转型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这是一个值得很好研究的问题。

第五，从分析方法来看，本书继承了以往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格，力求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并力求从理论上给予解释。但是，由于人员构成的变化，本书也有不少前进，主要表现在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有所加强。本书的很多章节构造了一系列理论模型，也有不少章节利用中国的统计数据对一些理论假说进行了经验检验。不过，这方面改进和提高了的余地还很大。这是需要今后继续努力的。

本书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先集体讨论研究提纲，再由各人分头写作，初稿完成后进行集体讨论评议，然后由各章作者

根据讨论意见进行修改，最后由主编总纂成书。总纂对各章的内容和观点基本上未作改动。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便于发挥每位作者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使很多问题的研究和探索能够深入一步；另一方面，便于相互启发，集思广益，弥补个人研究的不足，并照顾到宏观问题的广度。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每个人的理论背景、研究方法、写作风格，表述方式不同，不仅全书的整体性较差，而且某些具体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不过，这也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精神，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探索留下了空间。我们欢迎对本书的批评，也愿和大家一起继续推进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

本书由以下人员研究撰写，其具体分工是：第一章、袁钢明，第二章、王利民，第三章、张平，第四章、仲继银，第五章、桁林，第六章、王诚，第七章、盛洪，第八章、张曙光，第九章、杨帆，第十章、左大培，第十一章、赵志君，第十二章、刘霞辉，第十三章、魏众。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王燕坊、常欣的帮助，她们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组织工作。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责任编辑周丽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樊纲：《不能“煮糗糊”——兼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财经时报》，2000年8月16日。

卢锋：《宏观经济学对象是否应当包括长期问题？》对樊纲《不能“煮糗糊”》评论及一篇论文的评论（打印稿）（正式发表时，编辑作了删节），《财经时报》，2000年8月26日。

曼昆：《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张曙光主编：《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廖理等：《探求智慧之旅——哈佛、麻省理工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刘国光主编：《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中国计划出版社，1991。

樊纲主编：《体制改革与宏观稳定——中国体制转轨新时期的宏观经济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张曙光

2000年10月7日